

怀念——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线索征集:E-mail:www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(0531)85193207

怀念

一种机缘

□流沙

父亲和叔叔从小相依为命，但后来因为宅基地以及婶婶的介入，两人有了矛盾。

婶婶是个急性子，性格非常强势，加之她的兄弟姐妹多，婶婶经常放狠话，威胁我们全家。住在同一栋老屋里，口角一直不断。身心疲惫的父亲从老屋里搬了出来，花了两年多时间，欠了一屁股的债，终于在离村二里地的山脚下造了一栋土屋。

在口角纷争中，父亲是一位战败者，他一度十分伤感。因为在农村，凡是把房子造在村外的，大都是外姓，而我家搬出了村子，按照老一辈人的说法，算是“破落”了。而且当时建房的地方只有一条泥路，也没有水源，家里用水得到村子里去挑，生活非常不便。

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。三十年后，当时偏僻之处成了全村位置最好的地方，背靠山，面对一条溪水，房子绿荫环抱，不远处就是柏油省道。

前几年，我出了一些钱，拆了土屋，造起了一幢洋房，装修一新，引得村里人羡慕不已。双休日，我喜欢回家住上一两天，爬爬山，钓钓鱼，采摘一些自家种的新鲜蔬菜，让人心旷神怡。这样的好地方一度引得了大老板的注意，托人问能否出售，结果被父亲一口回绝。大老板于是加价，仍然被父亲回绝。

父亲开始非常“迷信”地认为，当年婶婶与我们家交恶，可能是一种机缘，是上苍让他得到了这样好的地方，而且自从搬出村子后，家里好事不断。

最让父亲得意的还是我。

住在老屋时，我的学习成绩极差，老师问我四加七等于多少，我算了一个下午还是算不出来。老师曾对父亲说，这孩子的脑子可能缺少一根筋。

我的愚笨在同龄人中出了

名。事实上，当时我住在村子里，玩伴众多，根本没有心思读书。

自从迁到了村外，有些玩伴看不起我了，不愿意跟我玩，我如果想找他们玩，也得走上两里地。我一个人上学、放学，有了忧愁。那时的时间很多，老师不会布置作业，放了学就等着吃晚饭，等天黑上床睡觉，实在闲得无聊，就拿起教科书当闲书来看，这一看就看出了门道。

我的成绩也就在几个月里发生了变化，所有老师都不得其解。直到期末考试我的成绩再次名列第一时，他们才信了，这孩子终于开窍了。

后来，我是村里十几个同龄人中唯一考上大学的，我留在了城里工作，还出了书，在县城里不少人知道我的名字。

父亲总是说：“咱家的风水好。”他买来了罗盘，找来了《易经》，想证实自己的想法。父亲只有小学文化，但硬生生地读全了一本《易经》，遇到难懂的古文，他会在书上标注出来，等我双休日回家向我请教。有时我也不懂，就上网给他查。经过将近十年的“学习”，父亲谈论起易经头头是道，有些知识连我也不知道。这真叫功夫不负有心人。

父亲在新房里还专门设计了一个书房，宽大的书桌，高高的书架，藏书比我还要多。他到城里来，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新华书店。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老农民，如此爱书、喜欢读书，这在农村真的是少见的。在村子里，父亲也成了让人尊敬的人，红白喜事，村里人都会请他去，有了矛盾，也会请他去调解。

生活真的是有机缘的。父亲认为那次伤心的搬家改变了我的命运，也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。回首这三十年，真的如此。我也相信机缘，它是那么捉摸不定，有些看起来糟糕的事情，也未必真的会让你糟糕，反而是助你成长，促成你改变的一个契机。

高考，只是一个窑盖儿

□柏兴武

1989年我高考的时候，父亲亲自去“陪考”。我知道父母对我寄予了很大希望，可是，我在考试的时候非常紧张，发挥失常。高考结束后，跟着父亲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淌。

我们到家时，母亲坐在门槛儿上。一看见刚过四十岁的母亲那布满皱纹的脸，我就一下子趴在了母亲的双腿上：“妈！我……”

母亲用她那粗糙的手一把扶起我，说：“武儿，什么也别说了，咱们先吃饭，我都等你们好久了。”

进屋后，父亲拉着母亲进了里间。我听见父亲悄悄告诉母亲，说我的压力很大，已经失去了生活的信心。米饭落进肚里，也没能把我心里的“疙瘩”挤出来。我钻进了牛角尖，只一门心思想着，高考失利，我以后怎么有脸见人，又怎么对得起早起早贪黑劳碌的父母？

见我一个人闷坐在屋里不说话，母亲拉着我的手就往后山走，“武儿，陪妈去看看土豆窖。”

我跟着母亲来到土豆窖，没等我开口说话，母亲就搬开窑盖，说：“武儿，下去看看土豆好不好？”

我木然地走到窑里。突然，母亲一下把窑盖盖上了，我立刻置身在黑暗中。

我不知道母亲要干什么，也没有勇气喊母亲，黑暗中的我想到自己的前途也将是一片黑暗就忍不住流下泪来，越想

玉普大哥，您在哪里

□逢春阶

5月22日上午8点40分，我接到报社同事短信：“刘玉普走了……”我哆嗦着手，拨电话求证。噩耗是真的，凌晨7点半，不堪病魔缠身的老兄，走了。我匆匆坐火车从北京往潍坊赶。一路上，我给好多熟悉的朋友发出悲讯，满脑子是兄长的影子。

刘玉普生前是大众日报社潍坊记者站站长、潍坊分社社长，我的老领导，我的新闻引路人，我的尊敬的兄长。

第一次见他，是二十四年前的冬天，在一个宴会上。我跟他同席。他目光里有股气，那股气，让我想起某作家写的“两眼一亮，满面威风”的话。我给他敬酒时，他说，小逢，你这个家族里有个逢先知，知道吗？我说知道，是毛泽东的资料秘书。他笑着说，他算是识字较多的。然后掏出一张名片，上写“刘玉普 大众日报社潍坊记者站记者”，名字下面是地址和电话。这是我第一次见记者，也是平生第一次得到名片。我一直把它揣在衣兜里，揣了好几年。

我当时觉得，刘玉普这个人有点傲气。逢先知，那是党内大学问家，怎么仅仅说他识字较多呢？时间长了我才知道，他是用识字多少来评价人的文化素质的。比如他说，潍坊这地方，能熟练运用五千字，你不出十个。他说，老舍《骆驼祥子》用字不过两千四百多个。你能用多少字？我说，不到两千。他笑着说，咱就两千字左右的水平啊！

我是从《潍坊日报》考到《大众日报》的。当时已经超龄了，刘站长专门跟报社反映，说我文笔还可以。因了他的举荐，我才侥幸成为大众报人。可是，头一次跟他采访，就丢了脸。

那是1996年的深秋，我们去潍坊机械局采访，我从家里带着一个老式黑皮包，穿着一个仿皮夹克。而他穿着西服，打着领带，健步疾走，我在后面紧跟，节奏老跟不上。那天采访了一下午。

我原来主要是干编辑，消息写得少。磨蹭了一天，才写出了初稿，他看了一遍说不行，没抓住要害，写得也太慢。“你记。”他皱着眉头口授。半小时，搞定。我头一次领略了他的采访风格：迅速、准确、利落。

写完，他说，出去采访，要注意仪表，你看你提着个黑皮包，猛一看像个农村赶大集的人，皮鞋也不擦擦。哪里像个省报记者。走路也要注意，要挺胸抬头，目视前方，显得很精神。我当时脸上火辣辣的，下了班，就跟媳妇去商场，买了一个比较好的公文包，还买了一条领带。

他是我们的站长，但他就像兄长一样，呵护着我们。无论是工作上，还是生活上。他曾领着驻站记者崔永刚和我一起去潍坊医学院学外语、计算机等。站上还订阅了大量的报刊，有时间就督促我们学，要成为“识字比较多的党报记者”。

他嫉恶如仇，尤其是对漠视百姓的干部的行径，更是深

逝者档案



- 姓名：刘玉普
- 终年：57岁
- 籍贯：潍坊安丘
- 生前身份：高级记者

恶痛绝。有一次，在市委门口，来了上访的，有个挺着啤酒肚的小干部说，这群刁民！他狠狠地刺了那个小干部一眼：“你有什么证据说他们是刁民！你有什么资格说他们是刁民！”吓得小干部低头走了。

一日，我们接到举报，某市交管部门，乱罚私营运输车的款。他性子非常急，叫上我，提上包就走。他开着车，越说越气，说着说着，手都撒了方向盘比划起来。我坐在副驾驶座上，很害怕出事故。好在他的驾驶技术不错。

但是调查的时候，他却无比冷静，一点点地据事实，写出的内参很结实，无半点情绪化语言。“写内参，不能掺杂个人情感。少用‘恶狠狠’、‘令人发指’、‘罄竹难书’之类的话。要平实。”结果，内参还没发出，交管部门闻听“刘玉普在调查”，部门一把手亲自来说明情况，不久，停止了乱收费。

兄长心很软，他早年丧父，家庭成分又高，受尽了歧视。他同情弱小的人，又特别重感情，过年过节，都要去看望他的老师，看望在艰难岁月帮助过他的人。他还资助过南方某省一个孤儿上学。有一次我记得是去昌邑采访，回来的路上，看到有个乞讨的白发老大娘，他掏出钱来，递到老人手里，并详细问为什么要乞讨。我说，乞讨的，骗子太多。他说，你也得会看，那些骗子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真正需要救助的，没有花言巧语。

他最愁的是求人。工作上求人，家里亲戚办事求人。比如成立分社后，有经营创收任务，比如亲戚安排工作。他每次都非常为难。到了所求的单位，他把求的事憋在心里，想说又说不出。有一次，他带我去某地一个企业，要办一件事。中午吃饭时，他猛喝酒，一杯一杯地，那次他喝了一斤多高度白酒。我非常担心。他说：

“说不出口，就喝酒，当喝到半醉的时候，才能说出来。”他就是这样的人，很豪爽，一点不愿意给人添麻烦。

他生病后，一开始朋友去看他，他都委婉拒绝，这固然有疾病造成的心理原因。其实，我明白，他主要是怕给人家带来麻烦。

他总是盼着别人好，盼着部下超过他最好。2000年7月，报社编辑部让我从站上回报社总部轮岗，刘玉普二话不说，亲自送我到济南，后来，我留到大众周末编辑部，他叮嘱我，一定要好好干。

2000年底，报社竞聘上岗，我刚从记者站回到编辑部半年，没打算竞聘。他给我打电话说，你试试，竞聘是展示自己的机会，平时你到领导那里去展示自己，领导还没空呢。现在，领导在台下听你讲，多好的机会。我听从了他的劝告，居然竞争上一个职位。他总是希望年轻人快快成长起来，能独当一面。我写了得意的稿子，他有时就打电话鼓励。

他在大众日报社干记者近30年，写过的新闻稿子大约有五百万字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他在山东新闻界，特别是潍坊新闻报道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。他生病后，在嫂子的悉心照料下开始写随笔，有回忆父亲的、回忆童年的、回忆故乡的，《大众日报》、《齐鲁晚报》的副刊发了几篇，写得情真意切。他还有好多的题目正在写，谁料，他竟匆匆去了。

我最后一次见他，是去年春节前，他斜靠在沙发上，头发已经白了，腿上盖着一条小毯子。他摸着我的手，久久不松开，眼里噙着泪花，沙哑着嗓子对我说：“春阶，你少喝酒啊。注意身体啊。”

他不放心的是我爱喝酒，而且容易过量。

我离开他时，他目送着我，使劲盯着我。他去世后，我才明白，他给了我一个最后的微笑，珍贵的微笑。

兄长止步于57岁，他的一生，如傲霜寒梅，好不容易奋斗着绽放几片花瓣，却过早凋零。天不假年，人生之残酷如此！

他的老母亲已年近九十，他的儿子尚未成家，而妻子没有工作。他带着满腹心事走了。在他家里，老母亲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说说，让我走多好，替替他，叫他活着，孩子还小。”

5月23日上午，在潍坊殡仪馆，亲朋好友，大都来了。十点半，我们一起去把他推到火化炉前，他像睡着了，很安详。炉门打开，我们不忍心推他进去，慢慢地，轻轻地……

他的山东大学同学、丁老师大喊一声：“老刘，走好啊！”炉前的我们，一起跪地，泪如雨下。炉门关闭。别了，我的兄长！

下午，他的骨灰，在故乡安葬。

我在心中为兄长写了副挽联：“忆昔曾跟随，同出入，共研读，铮铮铁骨，敢担道义，无语撒手兄先去；而今少依傍，速采写，录实况，娓娓话语，勤绣锦章，有疑捶胸我问谁？”

这些天，我总是在心里问，玉普大哥，您在哪里？

投稿邮箱: www.3207@163.com

